

柱中

第三卷

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

傅筑夫著

牛轉盤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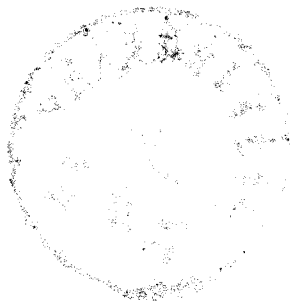


2 022 0405 1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

第 三 卷

傅 筑 夫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封面题字：范 曾

封面设计：白 湖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

ZHONGGUO FENGJIAN SHEHUI JINGJISHI

第 三 卷

傅 筑 夫 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25 印张 342,000 字

1984 年 10 月第 1 版 198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 8,200

书号 4001·497 定价 1.9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总 论	1
——晋至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经济概况及其特点	
第二章 两晋南北朝时期几个主要经济区域的变迁	25
第一节 北方古老经济区域的衰落与经济重心的南移	25
第二节 江南经济区的开发与新经济区的形成	33
第三节 晋南北朝时期的水陆交通与大运河的开凿 及其影响	44
第三章 空前巨大的经济波动	56
第一节 国家的长期分裂和社会经济的长期动荡	56
第二节 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经济发生巨大波动 的原因	77
第三节 人口的减耗和流亡	91
第四章 劳动制度与剥削关系	104
第一节 徭役劳动	104
(一) 徭役繁重的原因	104
(二) 北朝和南朝徭役劳动的主要项目	113
第二节 雇佣劳动	126
第三节 奴隶劳动	132
(一) 晋南北朝时期奴隶制度突出发展的原因及 其对社会经济特别是南朝经济所产生的 深远影响	132

(二) 官私奴婢及其来源	143
(三) 半奴隶或准奴隶等私附人口的增多	155
第五章 土地制度与土地问题	165
第一节 官田及其利用	165
(一) 官田的来源和南北两朝的占有情况	165
(二) 两晋和南北朝对官田的利用	174
第二节 私有土地与土地兼并	198
(一) 晋初的土地兼并与西晋的占田制度	198
(二) 东晋和南朝的私有土地与特殊形态的土地兼并	202
第三节 北魏的均田制度	210
(一) 北魏实行均田制度的历史背景	210
(二) 均田制度的内容和实行情况	220
(三) 均田制度实行的结果	229
第六章 农 业	235
第一节 垦田及水利	235
(一) 两晋和南朝时期的水利建设	235
(1) 西晋的重农政策与兴修水利	235
(2) 东晋和南朝的水利建设	244
(二) 十六国和北朝的水利建设	249
第二节 农业生产技术与经营管理	255
(一) 农田的耕作	255
(1) 南朝的土地利用与耕作方法	255
(2) 北朝的土地利用与耕作方法	262
(二) 农作物的种植	271
(1) 南朝的粮食作物与蔬菜瓜果	271
(2) 北朝的大田作物与果蔬林木	273
第七章 手工业	288
第一节 两晋和南北朝的官私手工业	288

(一)	晋南北朝时期官私手工业的发展概况和发展趋势	288
(二)	晋和南朝的官手工业	299
(1)	晋和南朝的工官和官工匠	299
(2)	晋和南朝的各种官手工业	305
(三)	晋和南朝的私营手工业	315
(四)	科学技术与工艺技巧	326
第二节	十六国和北朝的官私手工业	330
(一)	十六国和北朝的工官和官工匠	330
(二)	北朝的各种官手工业	337
(三)	北朝的民间手工业	345
第八章	商 业	350
第一节	晋南北朝时期南北两地的商业概况和 发展趋势	350
第二节	集市商业、城市商业和商业都会	361
(一)	小商贩与集市	361
(二)	城市商业	364
(三)	商业都会	372
第三节	南北互市	376
第四节	对沿边各少数民族地区和对外的贸易	383
(一)	内陆贸易与通商诸国	383
(二)	海上贸易与通商诸国	394
第九章	货 币	402
第一节	两晋南北朝时期货币经济的衰落	402
第二节	铜钱	413
(一)	两晋	413
(二)	晋世割据诸国	417
(三)	南朝	419
(四)	北朝	434

第三节 实物货币.....	442
(一) 两晋及南朝	442
(二) 割据诸国及北朝	448

第一章 总 论

——晋至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经济概况及其特点

我们曾一再引用马克思的一个重要论点：“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① 这是说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变化，是在它自身的客观经济规律支配之下，根据其“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② 从中国社会发展演变的全部过程来看，显然是经历了几个不同的自然发展阶段，虽然都受着一个总的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支配，但在各个不同的自然发展阶段上，又自有其不同于其他发展阶段的经济运动规律，并且正是由于各个阶段的经济运动规律不相同，所以才可以把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划分为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也正由于各个发展阶段各自有其独特的经济规律，遂使这个阶段既不同于以前的各阶段，也不同于以后的各阶段，于是就表现为自己独有的特点。这就是马克思所说：“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③ 这样，在研究社会经济形态的每一个自然发展阶段时，首先就必须找出这一发展阶段的经济运动规律是什么，它是怎样在这种特殊的经济规律支配之下，形成了它所具有的特点。

① 《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二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下同。

② 同上，第十一页。

③ 同上，第二三页。

例如本书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各阐述了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各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第一卷说明了典型的封建制度在其自身的经济规律支配之下，为什么必然产生在西周初年，又为什么必然崩溃在东周前期。这一个历史时代与继起的秦汉时代，显然是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发展阶段不同了，起支配作用的经济规律也随之改变了。前者是典型的封建制度时期，后者是变态的封建制度时期，具体说：前者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典型的封建土地制度——井田制度，剥削关系是农奴制剥削，社会经济的结构形态是领主制经济；后者的社会经济基础是私有土地制度，剥削关系是地主剥削佃耕农民的租佃关系（马克思称之为法律关系），社会经济的结构形态是地主制经济。总之，两者在性质上和结构形态上都不相同了，但是这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之间，又有密切的连贯性，即整个秦汉时代实质上乃是东周特别是战国时代的继续，因为上述的一切变化，都是在战国年间开始产生，到了秦汉时代才完全确立，并有了进一步发展。例如以自由买卖为基础的私有土地制度和地主制经济结构，虽然都是在战国年间即已开始产生，但都是到了秦汉时期才全面地发展起来，并成为了一种确定不移的社会经济制度。又如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都是从战国时期开始发展的，但是大量的和全面的发展，则是在秦汉时期。其他各个方面，无不如此。所以作为一个发展阶段的秦汉时期，不仅是战国时代的继续，而且是战国时期各种成就的进一步发展，前后两个阶段不但是互相连贯的，而且还一直保持着一种上升的趋势，在某些方面（例如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这种继续上升的趋势还是非常突出的。

晋和十六国至南北朝这一历史阶段，在时间上是在秦汉时代之后，但是这一个发展阶段却不是前一个阶段的继续，两者在结构的形态上和性质上都表现了很大的不同，如果把前一个发展阶段作为典型，来与后一个发展阶段作比较，马上就可以看出，这一阶

段在许多方面都是特殊的，或者说它表现了许多特点。例如上文已指出，从战国到秦汉，社会经济的发展一直保持着上升趋势——每一种制度都在沿着固有的运动规律继续向广度和深度方面发展，但是进入这一历史阶段，长期延续的上升曲线即陡然折而下降，不仅是一落千丈，而且是一蹶不振，在这一次衰落凋敝之后，久久未能恢复到固有的水平，所有过去在农工业的生产技术上和组织形态上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并已在世界同时期的历史上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以及在商品经济的繁荣程度上、在货币经济的突出发展上，这一切成就，到晋至南北朝时代，不是完全丧失，就是大大地倒退了。总之，这一个阶段，是社会经济的大衰落时期，是国家的大分裂时期，是整个历史的大倒退时期。因而前一时期的社会经济的运动规律，在这一时期是完全不适用了。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这一个发展阶段时，必须盱衡全局，观察这一阶段是在怎样一种不同的经济规律支配之下，形成了一些什么特点，它是怎样既不同于前一个发展阶段，也不同于后一个阶段。

一加观察，就可以看出以下各点——这里仅概括地指出其要点，至于各个问题的具体情况，均将于后文有关章节中分别论述。

（一）晋十六国到南北朝时期，国家在政治上发生分裂，社会经济发生波动和遭受破坏，这并不是第一次，当然也不是最后一次，在秦汉以前，国家在政治上曾经长期出现一种诸侯割据和四分五裂的局面，诸侯列国之间的战争也是十分频繁的，但是战争的规模都不大，波及的范围也不广，因而造成的破坏不烈。兵燹、饥馑、疾疫等向来是相随而至和相辅而行的，所谓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实是由长期生活实践体会出来的经验总结。当时战争所造成的破坏既不大，故灾荒饥馑的危害程度亦不甚严重。并且在诸侯列国的并存时代，每一个统治区域都是小国寡民，它们的统治者为了自存——不论是为了进攻还是为了防御，都知道国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

粟多者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把这一系列的连锁作用总起来就是足食足兵，而贯彻这一战略措施，不外是“田野辟”和“仓廩实”。为了能有效地实现这个总纲领，每一个小国的统治者不得不在其统治区域内，力求能安定社会，发展生产，消弭或尽量地减少灾害。这是先秦时期虽同样有天灾人祸，却没有造成毁灭性破坏的原因所在。

西汉初年和西汉末年曾两次发生过经济波动，其具体情况在本书第二卷中已经作了详细说明。这两次经济波动给国民经济所造成的破坏后果，是一次比一次严重。第一次的破坏由于时间不长，社会元气斲丧不甚，汉王朝建立之后，它的经济基础还是关中（包括大西北和大西南）的广大经济区和关东的古老经济区，这时两大经济区已密切结合成一体，其中关东经济区由于开发很早，又是自古以来各部族的一个汇集聚居之所，即所谓“都国诸侯所聚会，建国各数百千岁”。由于土地对人口的负荷日益加重，土地的自然肥力日渐衰竭，这个古老经济区曾一度显示了老化衰退之象，但到春秋以后，随着铁器时代的开始，牛耕和犁耕的发明，人工施肥和灌溉方法的普及等等新的生产方法的应用，使这一古老的经济区又焕发了青春，从此，关中和关东两个主要经济区就成了秦汉统一大帝国的基础，而且关东经济区又成了关中政治中心的重要支柱，每年需要“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①，仅为了养活官奴婢，就需要“下河漕度四百万石”^②，因黄河有砥柱之险，乃“穿漕渠通渭”^③，系“引渭穿渠，起长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三岁而通，以漕，大便利。”^④这说明旧经济区的基础还是

①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② 同上。

③ 《汉书》卷六，《武帝纪》。

④ 《汉书》卷二十九，《沟洫志》。

雄厚的，力量是强大的，虽遭受过一次天灾人祸的袭击，但由于时间不长，破坏不甚，而汉初统治者又采取了自由放任政策，以便于经济的自我调整，故恢复较快，不久便进入了全面繁荣时期，使两个经济区的潜力又得以充分地发挥出来。

发生在西汉末年至新莽期间的第二次大波动，天灾人祸经历的时间比较长，造成的破坏亦比较酷烈，所以在这一次大波动之后，由于破坏严重，元气大伤，断丧了社会经济自我调整的机能，因而恢复较难。尽管丧乱已经终止，社会秩序已经安定，而社会经济的残破之状，却久久未能改观，在后汉光武帝当政的三十年间，到处是疮痍满目，一片荒凉，其中关中区域所遭受的破坏，尤为惨重，因而恢复更难，以致新的统治者不得不放弃长安，改营洛邑，即把政治中心由长安东移洛阳。这说明两大经济区特别是关中经济区所遭受的破坏是十分严重的。进入东汉以后，经过一段比较长的凋敝时期以后，大体上从明帝朝起即开始逐渐有所恢复，到了章帝、和帝时期，也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繁荣。但是毕竟由于破坏严重，损伤了社会经济的内在机能，故终东汉一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但没有超过西汉曾经达到过的水平，而且更没有恢复西汉时社会经济结构所具有的内在实力，如与西汉的情况相比较，在一切方面都是低调的、虚弱的。总之，由战国年间开始历秦汉两代，社会经济累进发展的上升趋势，到东汉时就成为一种缓慢的下降趋势，到东汉末年至三国初年时，形势就急转直下，陡然一落千丈地下降到深渊。

由东汉末年开始的經濟大波动，到了三国鼎立之局确定以后，虽然略有缓和，到了西晋初年还曾一度出现过短暂的繁荣，但是实际上都是昙花一现，紧接着就出现了国家的空前大分裂和社会经济的空前大混乱、大破坏，两次波动之间的安定时期很短，不旋踵之间就把两次大波动连接起来，所以东汉末年与晋南北朝的两次

经济波动，实际上是一次巨大波动的前后两个段落，或者说是有一次巨大波动中间出现过短暂的间歇。因此，这一巨大的经济波动应当从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一八四年）发生动乱时算起，直到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五八九年）统一全国、结束丧乱止，前后共历时四百〇五年，即使除去三国和西晋的短暂安定时期，也足足混乱了三百四、五十年之久。在这样漫长的时期内，所有天灾人祸为害之酷烈和破坏之惨重，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天灾与人祸虽都具有巨大的破坏作用，而人祸实远甚于天灾，例如战争就是对社会经济的一种最直接、最强烈无比的破坏，马克思曾说：“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就能够使一个国家在几百年内人烟萧条，并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①在这一段历史时期内，毁灭性的战争连续不断，特别是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几个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几乎是“无月不战”，足足互相砍杀了一百三十多年之久，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大浩劫。广大人民，非死则逃，凡是没有来得及逃亡或老弱病残不能逃亡的，都成了疯狂屠杀的对象，一部《晋书》，特别是其中的《载记》，便是这样一部血淋淋的记录，以致整个北半部中国，几乎断绝了人烟，出现了所谓：“千里无烟爨之气，华夏无冠带之人”，茫茫大地，到处是“白骨横野”，“僵尸蔽地”。经过这一次长时间的大破坏，不仅几乎毁灭了一切有形之物——社会经济的积累和成就，而且确已“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

总之，以巨大经济波动为标志的晋至南北朝时期的大混乱和大破坏，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一个重大事件，它的影响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换言之，一切问题无不直接或间接与此有关——不是由它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由这个母体孳生出来的一个分枝，所有

①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六十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下同。

这时期的所谓社会经济的特点，实际上都是这个重大事件在某一方面的一种表现形式。

(二) 晋和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人口大迁徙时期——北方人口的大量南流时期。北半部中国的人口之连续不断地大量南移，是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发生巨大波动的一个直接后果。

以关中和中原两大经济区为中心的北半部中国（包括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是自古以来各族人民生息繁衍的主要区域，尽管这一地带早已由于人口的增殖超过了土地的正常负荷，但是这一地带乃是开发最早的主要精耕农业区，是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较有保证的地区，如果没有外力（包括人为的和自然的）的冲击和侵袭来打破社会经济的固有平衡，搅乱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谁也不肯轻易抛弃自己辛勤开辟出来的田畴和家园，无端远走高飞，飘泊异乡，去追求一个渺茫难知的命运。江南固然有远比北方为优越的自然条件，大家也都知道那里是土地肥沃，雨量充沛，气候温暖，适宜于耕稼，而大部分地区还是土旷人稀，虽然还过着火耕水耨，饭稻羹鱼的落后生活，但却是物产丰富，容易谋生，所谓“江淮以南，无冻馁之人”，因那里是“果隋羸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① 尽管有这些优点，但是直到汉末，江南地区还是一个没有开发的原始林莽地带。“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虽系一种传说，但确有不少地方是毒蛇猛兽、霍乱瘴疠之区，所谓“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呕泄霍乱之病相随属。”^② 这些情况确使人闻之生畏，故认为远适江南，实无异前往送死。结果，遂使江南富庶之区一直停滞在原始状态上，这就造成长期以来以长江为界，使南北两半个中国成为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

①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② 《汉书》卷六十四，《严助传》。

长江以北，是地狭人稠，熙来攘往，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愈来愈大；长江以南，是土旷人稀，有不少地区还是荒野无人之区，大都为原始森林所覆盖，以致有广大肥沃的土地，无人开发利用。

兵燹饥馑是迫使人们背乡离井，四散奔逃的一个直接原因，因为大难当前，人们为了活命，不得不流亡异乡，去自寻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所在。如遇特大的灾荒，政府由于灾情严重，灾民众多，而又无力进行有效的赈济，遂选择一个丰饶殷富之地作有计划或有组织的移民，这个被选定的地方，大都是地多人少的所谓“宽乡”，多数是选择巴蜀、江淮、荆襄等富庶之区，例如当汉初发生灾荒时，因“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①其后每逢关中发生丧乱或饥馑，大批流民即涌往汉中、巴蜀，因“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②，而且“其地四塞，山川重阻”，不论关中或中原有多少变乱，亦很难逾秦岭而波及巴蜀，故在灾害频繁和战火纷飞的时代，确是一个逃避灾难的世外桃源。在西汉武帝时；又曾先后向会稽和荆扬移民，其向会稽移民还有具体数目可考：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年），“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③据后人考证：“会稽生齿之繁，当始于此，约增十四万五千口也。”^④这是向江南移民的最早记载。后来到东汉安帝朝，又因中原灾荒严重，饥民众多，“恐非赈给，所能胜贍，虽有其名，终无其实”，于是乃将饥民“徙置荆扬熟郡，既省转运之费，且令百姓各安其所。”^⑤这是使灾民在江南定居，用以代替赈济。但是在汉代前后几次向江南移民，都是偶一为

① 《汉书》卷一，《高帝纪上》。

② 《后汉书》卷十三，《公孙述传》。

③ 《汉书》卷六，《武帝纪》。

④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九，《汉书卷三徙民会稽》。

⑤ 《后汉书》卷六十二，《樊宏传附准传》。

之，不管每次能够移往江南的绝对人数有多少，实际上则是杯水车薪，对于江南广大地区的开发，起不了多大作用。

到了东汉末年和三国初年，由于祸乱相循，饥馑荐臻，关中和中原两大经济区遭受到惨重破坏，各种天灾人祸均以排山倒海之势从四面八方一齐袭来，北半部中国顿时成了一片火海，广大人民之横遭屠杀，常常是鸡犬不留，往往数百里内空无人居，整个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大都是荆棘载途，人烟断绝了。就是在曹魏统一了北半部中国之后，政局虽早已平定，而荒凉景象则无法改变，“是时天下户口减耗，十裁一在。”^①这是说现有人口比过去减少了百分之九十，后来到了明帝时期，仍未有所改善。例如陈群曾对明帝说：“今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②人口的大量减少，除了相当大的一部分系被屠杀或被饥馑疾疫所吞没外，凡是有力量 and 有机会逃命的人——特别是男女丁壮，都四散奔逃了。逃亡的路线仍和过去相同，除少数逃往西北边区和渡海赴辽东者外，南逃的仍然是三条路：一是关中难民，初奔汉中，继往巴蜀；二是中州难民逾襄、樊流入荆州；三是幽、冀、并、青、徐、兖、豫以及齐鲁两淮难民，渡淮南逃，散居江东，三路难民，以这一路为最多，故亦屡见记载。这是北方难民南逃的第一个高潮。

这样的人口南流的高潮，到了三国鼎立之局确立后，曾暂时得到遏止，因彼此各守封疆，壁垒森严，人口不能自由流动。其次，曹魏统一了北方之后，政局已趋安定，百姓得以稍获苏息，魏晋两代又大举屯田，广修水利，极力安抚流亡，复兴农村，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使土旷人稀之状略有改善。可惜好景不长，为时不久即于永嘉年间（公元三〇八年）爆发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巨大的经济

① 《三国志》卷八，《魏书·张绣传》。

② 《三国志》卷二十二，《魏书·陈群传》。

波动，长期的战争和频繁的灾荒，使社会经济遭受到惨重破坏，其酷烈程度实远远超过东汉末年至三国初年那一次的波动，整个北部中国几乎被破坏到荡然无存，于是又掀起人口南流的第二次高潮，其规模之大，来势之猛，远非第一次高潮所能比，这是由于兵燹饥馑的涉及范围比第一次为广泛，破坏的程度比第一次为酷烈。这时南逃人口最多的一路，仍然是逾淮渡江，求在此无饥寒之患、无冻馁之人的易于谋生之处寄居。由于过江的人数众多，已非江东数郡所能容纳，遂不得不逐渐向更南的地带扩展，这样一来，便迅速改变了江南的荒凉面貌，原来是土旷人稀，甚至是空无人迹之处，现在都侨置郡县，以治理流人。由侨立郡县之多，说明南流人数是庞大的，因凡是侨立郡县的地方，都是流民聚居众多的地方。

（三）东晋南北朝时期是关中和中原两个古老经济区的彻底衰落和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时期。在汉以前，黄河流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当然也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从远古到周，我们祖先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黄河中下游的黄土冲积平原上，由西而东，沿着黄河形成一个狭长地带。这个经济区是开发最早的精耕农业区，直到殷末周初，是古代唯一的一个经济区，当然也是政治中心所在。据《管子》说，这里先后有过七十九代之君；司马迁亦说：“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①，这是说数百千岁以来，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一直是统一的，两者密切结合而从不分离。

上文已指出，这个古老的经济区，经过数千百年的生息繁衍，随着人口的压力日益加重和土地的自然肥力日益减退，遂日益走上衰老过程，从而逐渐丧失其原来的历史地位。随着周人之崛起

^①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